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

徐俊忠 主编

现代中国文艺的 价值转向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实践新探

VALUE CONVERS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NEW EXPLORATION OF MAO ZEDONG'S
LITERARY THOUGHT AND PRACTICE

罗嗣亮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现代中国文艺的价值转向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实践新探

VALUE CONVERS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A NEW EXPLORATION OF
MAO ZEDONG'S LITERARY THOUGHT AND PRACTIC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文艺的价值转向：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实践新探 /
罗嗣亮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8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

ISBN 978 - 7 - 5097 - 6125 - 0

I. ①现… II. ①罗… III. ①毛泽东文艺思想 - 研究
IV. ①A841. 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6988 号

现代中国文艺的价值转向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实践新探

著 者 / 罗嗣亮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范 迎

责任编辑 / 王玉霞 孙以年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6 字 数：361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125 - 0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丛书序言

这套“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丛书，是我和我的部分学生一个时期以来，主要学术工作的一个记录。在丛书出版之际，我愿意就我们对于毛泽东研究的相关问题的理解，谈一些认识，与大家分享。

一

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毛泽东研究会成为我们治学领域的一个重中之重。这种选择，既包含着我们对于自己未来学术规划的考量，更体现了我们作为当代中国学者对于国家的历史和未来的应有关注。

我是在中山大学完成从本科到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阶段的主要工作都在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上。因此之故，也接触了许多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读物，发表过一些文字，其中包括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若干篇文字。然而，我把这些工作都只是看作自身学术训练与积累过程的一个节点，而不是作为可以实现学术上安身立命的扎根地。

我觉得中国人需要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因为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都是党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被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国

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也变得与它息息相关。我也觉得中国应该认真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谱系树”上的重要分支，后者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来源和进行革命与建设的重要样板。事实上，由于我们原来囿于对这些内容研究不足，局限了思维结构和政治视野，限制了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融会贯通。这种局限实际上是政治思维、革命实践与建设实践中导致教条主义的重要原因。因为思想不解放，乃至固化、僵化，往往是由于参与思想的资源贫乏、单调和苍白。因此，很有必要不断加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和作为马克思主义“谱系树”上的重要枝干、分支思想的深入研究，否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格局就会越来越狭隘，甚至断流枯竭。

但是，就学术工作的意义而言，学术的魅力与生命都在于原创，而要在上述领域中实现严格意义上的原创性工作，我想对于大多数国内研究者而言几乎难上加难！

因为对于多数国人而言，这里存在着学术研究难以逾越的先天的限制，即语言限制。你毕竟无法像母语那样自在自如地去阅读作为研究对象的基本文献。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许多写作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著的学者，所依据的主要资料往往都是被翻译为中文的文献。在学风浮躁和粗糙的当下，这些文献的译文质量参差不齐，总的看来远不及当年中央编译局那个倾注心血的老翻译家群体所提供的翻译作品。这些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的文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研究的可靠基础，这对于我来说，是疑虑多多的。

即使真的能够解决文献阅读的文字问题，我们能否保证完全读懂文献的内容呢？因为特定文字的背后往往是特定的文化和生活，要达到对它们的准确把握，对于这个文化与生活圈子以外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容易克服的障碍。我们没有经历过“生产过剩危机”社会的洗礼，就始终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有牛奶倒进沟里、

河里、大海里的“荒唐”现象。只有广泛遭遇由“生产过剩”导致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才能深切地体会“劳动异化”概念的精妙之处。也只有经历过所谓“人才市场”的反复沉浮、淘洗，经历过就业市场上的“双向选择”的反复算计，经历过“人手”与“人才”在市场上的升值与贬值的过程遭际，你才能真正理解人被“物化”“工具化”这样的命题与理论。

除此之外，影响学术原创性工作的最大障碍是对于学术史的把握。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能够在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中，觉察出对于那个时代而言，很有新意甚至是富有全新政治意蕴的内容，除了他强烈的现实政治担当意识外，一个重要前提就在于他能够系统地、深入地、具体地把握这一问题的学术史，其中某些精微之处犹如握有学术上的显微镜。今天学人对于朱熹的研究，如果仅就朱熹的著作，甚至是仅就他的一本或有限的若干本著作，而疏于对关于朱熹的学术史的研究，包括朱熹的学术思想源流的把握，朱熹的经验世界所给予他的思想的影响，以及朱熹之后人们对其研究、评论和朱熹学说的影响等的理解，你能够期待这种研究可以成就出原创性的成果？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而修治学术史则需大量而广泛的文献收集、鉴别、筛选与研判等。我以为这对于许多从事外国学术思想研究的国人而言，是学术上最艰巨的难题。

也许正是对于克服这种难题的艰巨性的意识，自西学东渐以来，许多被认为西学功底深厚的学人，如胡适、陈寅恪、钱钟书等多年留学西方、熟悉西方学术的人士，回国后几乎都把主要的学术着力点放在中国学术问题上，他们被公认的学术成就也不是在西学问题上，而是在国故上，在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上。

能否把这几位当下被广泛认同的著名学者的经验看作学术上的前车之鉴呢？我相信一定是见仁见智的。但就我而言，由于畏惧对于西方文献尤其是学术史相关文献的准确研判和把握，更畏惧对于西方社会与文化的体验和生活经验的积累，自我觉得那是

一个根本难以成就学术原创性追求的领域，勉强为之，充其量也就是当一名西方学术领域中的“搬运工”或者“学徒工”而已。虽然这种学术“搬运工”或“学徒工”的工作，对于当下中国学术资源的引进，对于构建中国学术的多元结构和生态等，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但它的意义主要在于引进，而非原创。如果不能把这种引进变成资源的消化和方法的习得与会通，从而转化为对于中国本土问题的深耕和探究，那就只能长期充当西方“学术搬运工”的角色。这不仅不能使中国的学术真正有所发展，也会放弃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所应承担的责任，甚至还会带来其他诸如人才培养、学风养成等方面的消极影响。当今一些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就是遵循“学术搬运工”的套路去进行的。结果是学生读了一些西方作品，其中可能很大部分还是翻译成中文的，但是否真正理解其中的内容与实质，就不得而知了。至少每每参与这类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都会陷于学术与情感的纠结之中：他们能否当好西方“学术搬运工”，令人生疑，但却养成“言必称希腊”的表达惯性，而对于中国的问题却基本无知。如果年轻人过多地陷入这一路向的学术，于己于人于社会，都不会是一件好事。

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我愿意持续关注世界学术包括世界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动态，甚至是深度研读与研判。但作为未来学术上的安身立命的领域，我选择的是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最重要内容——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实践。

二

选择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实践作为本人未来学术上安身立命的领域，还包含着对于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这一课题之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的体认。

首先，毛泽东不论其思想还是实践，都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

的研究对象。

自从毛泽东逝世以后，国内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就开始生发出原则性的分歧。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虽然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力图以此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但事实上这一目的至少是未能完全实现的。尤其这些年来，社会上泛起了被称作“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也产生了与这种思潮针锋相对的红色左翼力量。它们在对于毛泽东的某些思想及其实践的评价问题上，几乎处于针尖麦芒的对立状态，社会的舆论生态，也由此而显现出某种被撕裂的征兆。

有人给毛泽东画出了种种负面的政治肖像，至于所谓新中国饿死巨大人口的指控，所谓“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的似是而非的责难等，更是五花八门。类似的言论、观点乃至鸿篇巨制，不仅流行于小报大报、流行于街头闲谈，充斥于各种不同的阅读空间，也流行于各种“高大上”的讲坛、视频。最近，我看到一个前些年的视频资料，国内一位所谓的著名社会学家面对一班学生，绘声绘色地侃谈毛泽东问题。尽管他所采用的资料，在专业研究者看来，许多是无稽之谈，有些还明显是已经被证伪了的，但对于许多年轻学生和历史知识积累并不充足的社会听众，却具有十足的蛊惑魅力。更有一些身份特殊、神秘的“精英人物”，不时在港台或国外媒体，抛出中央高层要人各种所谓有关重新评价和否定毛泽东言论的传言。这类亦真亦幻的“神风”传言，一旦与30多年来不断流行着的“非毛”“反毛”的社会舆论有所交互，就使得舆论界时常云里雾里，风雨不定，甚至时常激荡起某些政治上的波澜乃至惊涛骇浪。这些年来，我在农村做调研时，常常看到一些基层村官床头摆着的休闲读物中，多有各种盗版的粗制滥造的野史读物，传播着关于毛泽东的各种“鲜为人知”的故事。问题更在于，他们对此津津乐道！

与这一舆论面向相对立的则是另一番景象。每逢各种与毛泽

东的生命和活动相关的日子，全国各地的各种红色地标，包括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韶山的毛泽东广场等，总是人山人海，虔诚的情感和澎湃的激情，创造出全然不同于“非毛”和“反毛”氛围的另一个世界。甚至可以说，普罗大众尤其是一些工农群众对于毛泽东顶礼膜拜的程度，远远超过毛泽东生前的状况。据韶山的朋友说，春节到韶山向毛泽东“拜年”几乎已经成为民众的新年俗。据报道，这些年的除夕，彻夜寒风中在毛泽东广场“守岁”的每每都不少于五六万人，春节期间到韶山拜祭和瞻仰毛泽东铜像的人数更达五六十万。当然，由于人们对于毛泽东的纪念常常夹杂着对于现行社会体制、政策决策和社会现象的不满，甚至毛泽东被许多弱势群体当作维权和反抗的武器，使得毛泽东成为政府维稳部门特别是警察的敏感性因素。但不管怎样，毛泽东在这些群众的心目中，不仅是他们的利益代表，也是国家振兴、人民扬眉吐气的象征，因而成为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偶像。

本来对于历史的事件和人物，存有不同感知与判断，一般而言是常态社会的正常状态，但是，如果不同的见解演变成针尖麦芒的对立甚至对抗，则是社会病态甚至危机的体现。在对待毛泽东这个问题上，中国社会并非完全势不两立，走上对抗，除去个别极端案例，总体上看，普遍的对抗尚未形成。但是社会舆论和政治情感被撕裂的趋势已经出现，对立的存在不容忽视。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的尖锐存在，而且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调适，使得我们的社会长期处于意识形态上的紧张之中。这不仅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政治心态，降低了社会的政治包容度，而且直接地影响了政治共识的达成，尤其影响了当前正在推进的改革事业的发展、修错和完善。这种情况几乎出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领域。它不仅困扰着我们的政府、社会，也困扰着我们所有社会成员。它的影响，不仅在当下，而且在于未来。因此，负责任的政府和成熟的政治家应该认真地管控和化解这种

对立。负责任的学者也应该直面这种现象并认真地研究这种现象，为社会达成共识、化解分歧、降低对立等提供各种认知性和价值性的有益资源。从这一意义上看，致力于毛泽东的研究正是求解问题的一种重要努力。这意味着致力于毛泽东的研究，有着十分明显的社会历史意义。

其次，在我国毛泽东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及其研究的向度仍处于提出和显现之中。

我国的毛泽东研究，历史既长又短。自从毛泽东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就有对于毛泽东的社会关注和理论宣传。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和提高，他的各类著作也开始以多种方式得到较大规模的传播。根据我国著名的红色收藏家柏钦水先生的介绍，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是在1944年5月，由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对于全党工作的指导地位，宣传和阐发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重要工作，于是就有更多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问世。把毛泽东的著作结集出版，为世人全面理解毛泽东的思想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也是研究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探索过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这一过程交织着胜利的喜悦与激动，也夹杂着曲折徘徊与悲歌。这里留下了太多太多感人至深的壮烈故事，创下了太多太多震撼世人的壮举，积淀着太多太多宝贵的智慧与经验，也涵养着太多太多光彩人间的精神财富。但是，当一个思想仍然被作为国家革命与建设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时，不论如何，人们是无法把它当作纯属学术的研究对象去看待的。因为在这种态势之下，更多的是要求人们去说明它、阐发它，使其逻辑更加明晰和透彻，其微言大义得到合目的性的充分展示，成为具有更好说服力的“指导思想”。尤其在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治理出现困难以至于出现微妙而复杂

的变局时，统一思想以抑制政治杂音，甚至堵住通向与其目的性相背离的任何观点、思想和学说，就会成为国家治理和意识形态调控的必然选择。在这种状况下，不论如何，人们是不可能把它作为纯粹的学术问题去看待的。可以说，长期以来，中国舆论界的主要工作是把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把他的思想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大力宣传的。

只有在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后，主导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强化而逐渐位移和变化，毛泽东及其思想由此渐入历史的范畴，对其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才逐渐成为可能。事实上，正是随着毛泽东去世岁月的延长，历史的间距性加大了，毛泽东的许多文献、档案和其他资料等的出版也有了较大的进展，海外关于毛泽东的大量撰述也不断传入大陆，多元的观察视野和判断才开始普遍形成，学术研究的条件才逐渐地完备起来。

在这一过程中，两个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

第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形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客观上促进了毛泽东研究的“多分”向度的发展。《决议》提供的定义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①显然，未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内容，就应该被剔除于“毛泽东思想”之外。这一定义适应了党在特定时期意识形态的需要，也使党牢牢地掌握了解释毛泽东思想的主导权。但与此同时，它也从逻辑上打开了毛泽东研究“多分”向度的可能。因为《决议》拥立起作为党的意识形态象征的毛泽东思想。它从理论到实践，都被定义为“被实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156页。

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因而至少是不包含错误的。与此相应，《决议》特别强调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这样，在逻辑上，至少就有了两个不同的毛泽东：一个是作为被定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因而不包含错误的“毛泽东思想”代表的毛泽东，另一个是包含对错于一身，特别是“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毛泽东。其实，说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是否意味着应该把那些带有未来预见性质的思想剔除呢？说它的内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是否意味着不包含“关于中国建设的”内容呢？事实上，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毛泽东毕竟就是一个。他叱咤风云几十年，书写出一部部历史的鸿篇巨制，留下了许多理论与实践的遗产，其内容不仅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也有大量是关于中国建设的，还有一些是远超中国而属于世界范围的。它既有一些是被实践证明的，也有一些属于对未来预见性质因而现在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被实践证明了的。在被实践证明了的的内容中，有些被证明是正确的，有些也被证明是有过失的和错误的，甚至是有严重错误的。如果考虑到实践证明是一个过程，甚至是反复的过程，问题就更不那么简单了。至于某些宏大的社会改造计划，其影响因素十分复杂，依据其实践的后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很有把握就说它被证明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都是十分困难的。但不论如何，历史呈现出来的毛泽东就是一个包含着多面向、多维度的高度复合性人物。《决议》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选取其中的一个面向，从统一全党认识的维度看，无可非议，但从逻辑上却使人得到的毛泽东至少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毛泽东研究的多个面向的基础由此奠定。

第二，被指称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这一思潮以反思毛泽东晚年错误为发端，逐渐延伸到深挖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历史由来，进而引发对于毛泽东的道德声讨与清算。各种“揭秘”“鲜为人知的故事”也大行其道。尽管这类撰述在史料选

择和运用以及逻辑与文字的表达等方面，都不是无懈可击的，有的甚至是大有问题的，但他们在长期以来都以“红、光、亮”为主色调的毛泽东形象世界上，投进了另外一种复杂的色块。这种空前的新鲜感，激起了人们对于历史的猎奇心态。供给与需求由此形成了互动，并创造出一个持续的市场。时下，专事质疑、非议、“解密”、“揭秘”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政治书刊，销量持久不减的现象，就是这种状况的体现。而这种状况在瓦解一部分人原有信仰与政治态度的同时，也激发了另外一部分人走向历史深处的动力。由此，促进了多元史料挖掘、呈现，推动了以多元观点为立场的多种多样撰述的问世。不论如何，这在客观上推助了毛泽东研究的多个面向的开启与深化。因为没有这种多面向研究的开启与深化，至少失去了许多比较、鉴别的资源和动力。

然而，我们把毛泽东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对象的时间毕竟不长，许多文献仍需进一步激活、整理和深耕，多维的研究面向仍需进一步打开和拓深，尤其许多涉及毛泽东，涉及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革命、建设的重大历史与理论问题也由于社会环境急剧变化的不断刺激，仍然处于不断提出和展开的活跃时期，毛泽东研究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加大力度去耕耘的重要学术领域。因此，我们自觉地把研究的聚焦点放置于这一领域，其中的重要根据也在于这一判断上。

三

我们把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实践作为未来学术上安身立命的领域的选择，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确实具有非常独特的魅力，它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的学术富矿。

以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为例，毛泽东最具有超越意义的思想与实践就在于他明确地反对党内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从而开始探索一系列基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

义建设构想，这是我们所说的“学术富矿”的重要所指。显然，所谓“学术富矿”，既指丰富而又尚未被充分开发，也指其意义和价值突出而仍未被充分发现，或者至少部分仍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人们对于毛泽东的最大误解、误读的内容，莫过于毛泽东与党的八大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关系。这些年来，人们对于中共八大的路线是充分肯定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因为这次大会确认了“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①。实事求是地说，主观上，对于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毛泽东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的。问题在于党的八大有一个“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其中提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实质是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②。这一提法，当然是为了论证发展生产力的合理性。但是如果确认了这一提法，那就意味着否认社会制度改革与调整的必要性，但这恰恰是毛泽东无法认同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建立确实开辟了中国人民解放的广阔前景，但是，我们所建立起来的那个制度系统是否都属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范畴，这是大有问题的。

在他看来，我们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系统，并非都能以“先进的”去统称。1955年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货币工资制的改革方案中，毛泽东就觉得这个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巨大倍差，至少就不是“先进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36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341页。

的”。在1956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他明确指出，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也减少一些薪金，并且取消特殊待遇，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艰苦奋斗，不能脱离人民。他还经常批评那个严重脱离群众的高干保健制度，尤其不能容忍新中国一成立，北京医院就马上变成只供中南海里的高官看病的贵族医院。他也多次明确反对在中小学教育体系中，开办干部子弟学校的做法。这类制度安排，最令他不安的是，他真切地感受到党的干部存在着脱离人民群众的诸多危险。

这些危险的存在，有些来自干部对于特殊利益的追求，有些则是来自对苏联不好制度的照搬照套。他说：“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讲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①

更为全局性的判断，是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们在经济与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他说：“全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工作、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在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几乎全部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搬得也相当厉害。……卫生工作也搬……”^②

正是依据这种认识，他主张对于我们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系统，应该进行具体分析，至少不能把它们笼而统之地都看作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6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8页。

“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因此，党在新时期的任务也不应该仅仅被归结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样的单一问题，而应该是“改革和建设”^①同时并举。因此，如果说，毛泽东与党的“八大”的政治判断，与当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主张有什么冲突的话，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生产力上，而在于究竟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是坚持“改革和建设”并举的问题。

这一分歧现在看来，是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重大分歧。毛泽东从来都不是教条主义者，他不相信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制度就真的有什么天然的先进性。他也清醒地看到，苏联的那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本身就有许多不好的东西。对它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有悖中国实际。甚至在毛泽东看来，在苏共“二十大”揭开了“盖子”之后，如果我们还执迷于它那套社会主义建设制度，那就不是亦步亦趋的问题了，会犯极大的错误。因此，中国要建设，同时也要改革。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不应该被归结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必须坚持“改革和建设”并举的方针，以便借助改革，使我们的制度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不论如何，毛泽东无法同意“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达，因为它不仅忽视了改革，还可能掩盖我们制度的弊端。

问题的提出，预示着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开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个新的征程。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一大批关于农村发展、关于工业政策、关于教育改革、关于医疗卫生改革、关于文化建设等的文献，都体现了毛泽东的这种自觉追求。从毛泽东后续的思想与实践中，我们发现，“改革和建设”并举几乎成为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5页。

稳定的主线，成为不可移易的逻辑。后来发生的批判“唯生产力论”，反对“经济主义”等，都与这一主线和逻辑直接相关。也正是对于这一主线和逻辑的坚持，他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力图依据国情和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进行广泛的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探索。遗憾的是，这些年来，由于社会思潮的影响，毛泽东这些探索的意义仍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下面仅从几个侧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关于“虚君共和”的改革思路。毛泽东十分不满“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中国形成了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他认为，这种体制好处是便于社会动员，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它易于滋长官僚主义，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因此，不是支撑国家长期发展的好的体制。为了推动改革，毛泽东纵论古今中外，指出“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很快。而中国自秦朝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积极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①。他的结论是：“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②又说：“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情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③在毛泽东的这种构想的推动下，在他在世时，曾经有过两

①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第75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第559页。